

#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研究綜述

• 潘志平

1944年夏秋，新疆政局劇變。統治當地十二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職還未離去之際，8月17日，一支小小的游擊隊在伊犁鞏哈縣（今尼勒克縣）烏拉斯台打響了武裝暴動的第一槍。10月7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吳忠信就任第四天，鞏哈縣縣城被攻破。11月7日，由蘇聯入境的六十多名武裝份子與鞏哈游擊隊在伊寧發起暴動，經過六天激戰，攻佔了伊寧市國民政府所有軍警據點。11月12日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這一事件在台灣和西方學界一般稱為「伊寧事變」。至1945年夏，這個「共和國」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個地區。1946年6月6日，伊犁、塔城、阿山暴動區人民代表與國民政府簽訂《和平條款》，並宣布「『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三個地區已分別直接歸屬於省政府」<sup>①</sup>，雖然名義上取消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這三個地區仍處在武裝割據之下，一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1944年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自1930年代以來不斷湧動的「東突厥斯坦」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運動是以「東突厥斯坦獨立」為口號、綱領和行動目標的民族分裂運動。然而，1944年的這個「共和國」牽涉的問題複雜得多：首先，它一直與社會主義蘇聯有扯不清的關係；其次，毛澤東1949年8月18日致電這個政府代表稱：「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sup>②</sup>195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各種官方文獻稱之為「三區革命」，而不說「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因此，很長時間裏，至少在中國大陸學界，不聞「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而只有「三區革命」。

曾任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紀大椿在1980年撰文說，「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這一歷史事件「長期以來是一個語焉不詳、諱莫如深的敏感問題，甚至是不敢涉足的學術禁區」<sup>③</sup>，自紀大椿做上述表示之後，迄今又已過去三十多年，隨着政治因素的淡化，關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有了很



1944年11月12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

大進展。本文將就蘇俄和中亞學者、西方學者、中國大陸學者、台灣學者、海外華裔學者關於這個「共和國」的研究狀況進行綜合評述，以探究有關這個「共和國」研究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不同國家、地區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特點，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之處。

## 一 蘇俄和中亞學者的研究

愈來愈多的史料證據都一再證明，蘇聯深深捲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事務，甚至可以說，沒有蘇聯的政治的、特別是軍事上的作用，這個「共和國」能否存在一天，都是個問題。因此，有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一直為蘇俄學者高度重視。

自195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學者的早期研究更多強調這場運動是「民主運動」（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並力圖與毛澤東1949年8月18日電文相吻合。雅可夫列夫（А. Г. Яковлев）在〈1944-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認為：帝國主義進入新疆的目的就是反蘇，「三區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運動<sup>④</sup>。庫特盧科夫（М. Кутлуков）的論文〈1945-1947年南疆喀什地區人民民主運動〉認為：南疆人民為了民主和自由與國民黨政府開展鬥爭，並最終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社會<sup>⑤</sup>。他在另一篇論文〈1944-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運動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中說：「這一運動初期是帶有民族主義以及力圖把新疆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色彩……，只是在後來的鬥爭中，起義的領導人逐漸開始明白與中國人民聯合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的立場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蘇聯認為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⑥</sup>敏古諾夫（Н. Н. Мингулов）的論文題目乾脆就是〈新疆人民民族解放運動是整

個1944-1949年革命的組成部分》<sup>⑦</sup>。以上蘇聯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立場，與當時蘇中處於最美好的「蜜月」時代特徵相適應。

隨着19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此後，蘇聯學者轉而強調這場運動是「原住民」（корен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的「民族解放運動」（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如哈克木巴耶夫（А. А. Хакимбаев）的論文〈二十世紀30-40年代新疆原住民族解放運動〉，其標題就說得非常清楚<sup>⑧</sup>。拉希莫夫（Т. Р. Рахимов）的論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中國新時期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地位〉認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反對漢族統治者的民族運動」<sup>⑨</sup>。而曾是「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民族軍副總指揮、1949年隨民族軍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祖龍太耶夫（Зунун Таипов），則著書《為自由而鬥爭》，公然提出，新疆要麼應該像蒙古人民共和國一樣得到獨立國家地位，要麼就應該成為蘇維埃聯盟的一個獨立國家<sup>⑩</sup>。這一時間，蘇聯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完全服務於對中國的意識形態鬥爭。

在1990年代末，俄羅斯學者巴爾明（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出版了《蘇中關係中的新疆（1941-1949）》，將1940年代的新疆放在蘇中關係的大背景下進行討論，「北疆三區起義運動」（Восстание в Трёх северных округах）和「蘇聯對待『三區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трёх округов）的立場」成為這本書關注的主題。他首次引用了一些解密的蘇聯檔案資料，最重要的發現是，「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1944至1945年北疆三區起義運動的成功在許多方面取決於蘇聯全方位的積極援助」<sup>⑪</sup>。巴爾明雖然還未將所有的細節問題都弄得清清楚楚，但無論如何，在利用蘇聯檔案研究這一問題上開了一個好頭。

歷史研究經常受到政治干擾，像「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這樣涉及到中蘇關係中相當敏感的歷史研究，尤其如此。蘇俄學界有關這個「共和國」不同時期的研究傾向，也正生動地反映蘇俄在不同時期與中國的政治關係。

中亞國家與新疆毗鄰，這些國家的學者對「東突」問題也有一定的興趣。哈薩克斯坦資深中國學學者瑟羅耶日金（К. Л. Сыроежкин）在2003年出版的《中國民族分離主義的幻夢與現實及中亞地區安全》是一部重要著作，他用「幻夢」（Мифы）來形容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為旗幟的「東突厥斯坦」運動<sup>⑫</sup>。中亞國家學者一般將「東突厥斯坦」運動定性為「土著維吾爾民族」問題及其自決權相關的「民族解放運動」<sup>⑬</sup>。對此，瑟羅耶日金批評說：「這樣做，學術上是經不起推敲的，而政治上則是有害的。」<sup>⑭</sup>

## 二 西方學者的研究

195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不乏涉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問題的研究。美國學者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和貝洛夫（Max Beloff）的著作，在論述蘇聯遠東政策與新疆問題時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新疆「東突厥斯坦」的歷史<sup>⑮</sup>。惠廷（Allen S. Whiting）與盛世才合著的《新疆：小卒還是軸心？》一書，更多地站

在盛世才的立場敘述伊寧事變的背景及其與蘇聯的關係<sup>16</sup>。英國學者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的《中國中亞軍閥與穆斯林：1911-1949年民國新疆政治史》是一部新疆近代史概論，這部著作對民國時期新疆的政治史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其中第六章關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sup>17</sup>。米華德(James A. Millward)、鮑溫德(Gardner Bovingdon)、杜磊(Dru C. Gladney)等美國學者為《新疆：中國穆斯林聚居的邊陲》一書撰寫的相關篇章，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東突厥斯坦」問題<sup>18</sup>。美國學者鮑大可(A. Doak Barnett)和泰勒(Christian Tyler)的著作也涉及到這一問題的研究<sup>19</sup>。以上這些學者主要關注點在於新疆當前的現實問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問題是他們分析研究現實問題的背景陳述，他們對於相關敏感問題的描述還是比較謹慎，因為不是這一問題的專門研究，也就沒有特別重要的發現。

事實上，在「東突厥斯坦」問題上有專門研究的西方學者是本森(Linda Benson)，她在1990年出版的《伊犁叛亂：穆斯林對中國新疆政權的挑戰》一書是西方學界對這一問題最具權威性的論著，她的基本觀點是：伊犁叛亂是突厥穆斯林民族與外來的中國侵略者之間的衝突。她強調中國新疆當局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暴虐統治的同時，並不重視蘇聯對這一事件的影響和作用<sup>20</sup>。按照她在另一篇文章〈1940年代的維吾爾政治人物：伊敏、艾沙和麥斯武德〉的說法，新疆地方民族的反抗運動受到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近代土耳其及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影響<sup>21</sup>。本森還為文集《新疆：中國穆斯林聚居的邊陲》撰寫了第七章「新疆少數民族的教育和社會流動」，說道：「長期以來，一些富裕家庭，尤其是在新疆以西的穆斯林世界有親屬的，往往將自己的孩子送往穆斯林國家上大學」，「1944年成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幾位領導人，包括有非凡能力的阿合買提江在內，都在蘇聯中亞加盟共和國的大學留過學」<sup>22</sup>。事實上，至1940年代「東突厥斯坦」運動領導人已明顯地分化出親蘇與反蘇兩個政治派別，本森這裏指出的是這兩派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

### 三 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

紀大椿於1980年撰寫〈蘇聯與新疆三區革命〉，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學者關於這一問題研究的開創者。紀大椿潛心研究的最重要的結論是：「三區革命鬥爭的功與過，都有蘇聯人的份。」<sup>23</sup>寥寥數語，份量可謂不輕。儘管當時有關的蘇聯檔案還未解密，但其所做的研究並未過時，至今還不能忽視其重要的學術價值<sup>24</sup>。此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校教授朱培民發表了〈1943年至1949年蘇聯對新疆政策的演變〉一文。他認為在1943至1949年期間，蘇聯對新疆政策發生過三次變化：支持和策劃「三區革命」，協助國民政府政治解決新疆問題，支持中共促成新疆和平解放<sup>25</sup>。新疆大學教授徐玉圻領銜主編的《新疆三區革命史》，為第一部系統研究「三區革命」的史著<sup>26</sup>。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杜榮坤等人合著的《新疆三區革命史鑒》雖然最近剛出版，但還是

作者二十年前撰寫的<sup>⑳</sup>。這些研究成果代表中國大陸學界1990年代的研究水平，明顯地突破過去竭力迴避的一些問題，如蘇聯與「三區革命」間的關係。

也是這個時期，一批學者在「雙泛」（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有：紀大椿的論文〈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對新疆的滲透——兼評分裂主義的旗號「東突厥斯坦」〉，系統論述了甚麼是「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甚麼是「東突厥斯坦」，它們是怎樣產生的，怎麼傳播到新疆來的。文中特別指出，1940年代「一方面是境外進來的用馬列主義詞句偽裝起來宣揚『東突厥斯坦』『獨立』的宣傳品，一方面是當地赤裸裸的泛伊斯蘭主義直接煽惑，造成群眾的思想混亂，其危害是相當巨大的」<sup>㉑</sup>；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長馮大真主編的《〈維吾爾人〉等三本書問題討論會論文集》和新疆社會科學院院長楊發仁主編的《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研究論文集》，收錄了新疆和內地一些學者的重要論文，是國內學術理論界對「東突厥斯坦」思想的集中清理<sup>㉒</sup>。

1990年代末以來，除了新疆本地學者繼續研究工作外，還有上海、北京、蘭州等地大學、科研機構的學者從歷史、國際政治和民族學的角度，積極參與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無論從內容和質量上看都更上一層樓。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沈志華的〈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是研究「三區革命」與蘇聯問題的一篇具份量的論文<sup>㉓</sup>，這篇論文充分使用了蘇聯解密檔案，將「三區革命」放在中蘇結盟的大背景下展開討論，認為蘇聯對新疆政策趨向，時而與地方當局結好，時而同少數民族聯合；時而支持獨立，時而強調自治；時而表示強硬，時而傾向緩和；時而支持國民黨，時而援助共產黨，但其目標始終是在中蘇走向同盟關係的大前提下，從政治和經濟上確保蘇聯在新疆的優越地位和特殊影響。沈志華多年致力於蘇聯解密檔案的搜集、整理、翻譯工作，對於與蘇聯有密切關係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貢獻重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薛銜天的〈試論民族因素對蘇聯調停三區革命的影響〉和〈是推進新疆革命，還是維護自身安全？——關於蘇聯調停三區革命的民族因素〉認為，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亦即民族分裂主義的威脅，迫使蘇聯採取了務實政策——促使三區與中國中央政府和解<sup>㉔</sup>。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黃建華的《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描繪了國民黨勢力1943年進入新疆後，與三區軍事對峙階段的決策過程中國民政府統治新疆的政策<sup>㉕</sup>。《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第四任主任厲聲的重要著作，是一部新疆歷史與現狀的概述性著作，第五章專門論述了「三區革命運動與新疆和平解放」，其突破是除了使用了一些蘇聯解密檔案外，還引證了俄羅斯學者巴爾明關於蘇聯與「三區革命」的研究成果<sup>㉖</sup>。此外，還有新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延琪、新疆師範大學教授杜瀚等人關於「三區革命」的專題論文，分別探討了三區政府機構設置、軍事鬥爭、農業生產發展等問題<sup>㉗</sup>，對我們具體了解這個「共和國」政權的內部結構、軍事和實業發展等細節問題有所幫助。

新疆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所長潘志平主編的《民族自決還是民族分裂：民族和當代民族分立主義》和蘭州大學副校長楊恕的《世界分裂主義論》，則是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相關的新疆民族分裂主義理論著作<sup>⑤</sup>。陳延琪、潘志平主編的《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潘志平等著的《「東突」的歷史與現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第三任主任馬大正等著的《「東突厥斯坦國」迷夢的幻滅》是有關這一問題的普及讀物<sup>⑥</sup>。特別值得一提，楊恕等人根據解密的蘇聯檔案中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布）中央的一份關於新疆問題的報告，對蘇聯準備再度干涉新疆事務的企圖做出分析，認為蘇聯是1940年代中後期新疆一系列變故的幕後策劃者和支持者，可以確定蘇聯從來就沒有放棄對新疆的關注，只不過隨着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蘇聯的新疆政策有時明顯、有時隱蔽罷了<sup>⑦</sup>。

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大陸學界有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已取得顯著進步。筆者以為，束縛這一問題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礙有：一、它與蘇聯的關係；二、毛澤東關於它「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的評價；三、如實地評價早期與分裂相伴隨的民族仇殺活動。上述第一條已突破，而二、三條仍是不大好直面的問題。

#### 四 台灣學者的研究

自1949年國民政府去台後，外交部、國防部和蒙藏委員會的有關檔案和當事人的回憶錄相繼出版，其中自1950年代以來張大軍的《新疆近四十年變亂紀略》、《四十年動亂新疆》、〈新疆伊寧事變與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成立及其潰滅〉和十二卷本《新疆風暴七十年》<sup>⑧</sup>，既有作為歷史當事者的回憶，又收錄了大量當年的新疆歷史檔案，對「東突厥斯坦」運動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台灣方面的研究不甚多，但做得很認真、規範，如許秀蓉的研究，仔細地梳理了張治中代表國民政府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談判過程以及新疆局勢演變過程<sup>⑨</sup>；再如吳啟訥的研究，則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這一涉及民族關係的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和國際競爭的大背景下討論，還是具有獨到見解的<sup>⑩</sup>。不過，吳啟訥評論：台灣方面「仍大致傾向於將伊寧事變定位為蘇聯實現其吞併新疆野心的第一步。這種觀點顯然建立在1940年代後半期中華民國政府作為全中國主權的代表，以及國民黨反共抗俄的意識形態這兩個認知基礎上。對待後來變節的張治中，台灣研究者傾向於指責他在面對伊寧政權時，無原則地妥協退讓，背叛，出賣黨國利益」<sup>⑪</sup>。的確，這些大體是站在國民黨「黨國利益」上的研究，可以理解，但新疆問題是中國的問題，畢竟不是「黨國」的問題，相信台灣同行會有新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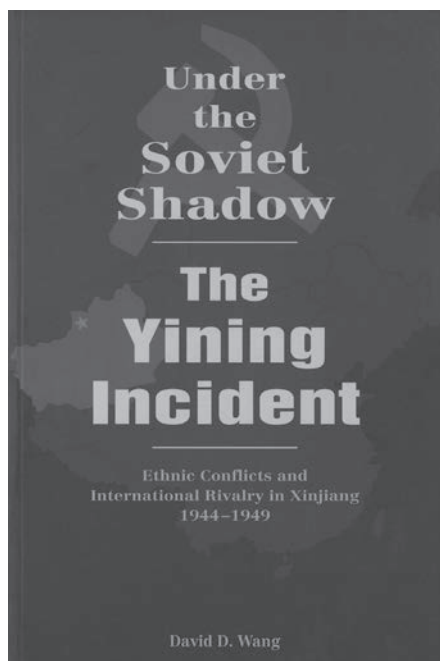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950年代，國民政府高官朱家驊與流亡在土耳其的「東突」頭目穆罕默德·伊敏（Muhammad Amin Bughra）有書信往來。朱家驊對這位多年的「友人」「有要新疆脫離中國而獨立之意向」，「不勝驚異」，就

其「所謂新疆問題」三次覆函，從歷史、民族、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駁斥伊敏獨立的四點理由，義正辭嚴<sup>42</sup>。這生動地說明，「東突」之右翼伊敏曾一度投靠國民政府，與「東突」之左翼，即以蘇聯為後援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貌似對立，但分裂新疆的政治訴求是一致的，而中共與國民黨有那麼多的恩恩怨怨，但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大事上卻是心心相印。

## 五 海外華裔學者的研究

至於海外華裔學者的研究，以王大剛和王柯的研究最值得關注。他們都生長於新疆，有特殊的「新疆情結」，因此，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擁有兩方面的優勢：一是生長於新疆的經歷、背景，容易搜集中國大陸特別是新疆本土的相關第一手史料；二是身居海外，其研究環境也相對寬鬆。

旅居澳洲學者王大剛的《在蘇維埃的陰影下：伊寧事變——種族衝突和新疆國際競爭，1944-1949》是一部優秀著作<sup>43</sup>。作者的基本觀點是：伊寧事變絕非單純的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運動，也非單純的中國內部事務，而是許多國際、族際複雜因素交叉互動的結果。從這本書的標題就可表明作者特別強調的是，蘇聯在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建立一事上起着決定性的影響。王大剛認為，斯大林關於新疆政策的目標和結果，不可就事論事孤立地看待，必須放在蘇聯亞洲政策中來考慮。當時，新疆漢族統治當局與地方民族長期的歷史衝突正好為蘇聯擴大影響力並排斥英、美、日的影響，提供了絕佳時機，只不過國際政治現實不允許同時製造第二個「外蒙古」；在新疆製造「國中之國」反而更加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王大剛大量使用了第一手英文資料，如書目中列出的美國駐迪化和重慶外交官發給華盛頓的數百封電報，極具史料價值<sup>44</sup>。有評論說：王大剛關於蘇聯操控「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之議，「就史料證據之堅強，可謂鐵證如山」，但同時也批評說：「低估了新疆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和宗教的力量。」<sup>45</sup>無論如何，王大剛的這部厚重的專著問世，大體扭轉了1990年代以前學術界關於當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與蘇聯關係語焉不詳的研究狀況。



澳洲學者王大剛的《在蘇維埃的陰影下》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是旅日學者王柯的研究成果<sup>46</sup>。總的看來，王柯與王大剛分別獨立完成各自的研究，但基本觀點不謀而合。王柯的四個考察視角或許是他的重要創新：一、新疆地區社會及突厥

伊斯蘭民族社會的社會結構；二、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與質變；三、「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內部結合原理和共和國的權力構造；四、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sup>④</sup>。這本書是他在1995年日文出版的博士論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中國的伊斯蘭和民族問題》<sup>⑤</sup>基礎上的增補改寫本。王柯近年來還發表了一些較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和著作<sup>⑥</sup>。這些著述中的一些創建性的觀點和認識融入了這部增補版的著作之中。問題是，王柯的增補本易名為「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但對1930年代喀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sup>⑦</sup>，只用了三頁一筆而過，主要內容仍是論述1940年代伊犁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歷史。其實，1940年代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也並非僅是「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總統」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等人的活動，需注意的還有投靠國民政府的麥斯武德·沙比爾(Mas'ud Sabri)、伊敏和艾沙·尤素甫·阿爾普特金(Isa Yusuf Alptekin)「三位先生」<sup>⑧</sup>，故此，易名反倒名實不符。此外，王柯之作對前人的成果吸收不足，如對王大剛已公布的美國外交官發給華盛頓的數百封電報似乎視而不見。難怪王大剛的「書評」就該書「甚至沒有提及」自己的那本書，似有微詞<sup>⑨</sup>。

## 六 小結

1944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成立，迄今已過去七十年整。有關這個「共和國」的研究總是不得不要受到種種政治因素的限制和左右，或者說，這個「共和國」研究的本身就是政治。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許多政治因素淡化了，學術研究的空間得以擴張，許多問題能夠得到更加符合實際的解釋。比如，蘇聯方面當年是那麼堅決地試圖將自己與這個「共和國」的關係切割，而現在俄羅斯學者卻能自由地利用解密檔案尋求其中的真相。同樣，關於這個「共和國」的研究，在中國大陸學界曾長期被視為「諱莫如深的敏感問題」，但是自1980年以來，有關研究有了相當的進步，特別是這個「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完全可以自由研究，但問題是還需擺脫「階級鬥爭觀」的演繹，突破「革命史」研究的困境。台灣、海外華裔學者的研究，本來就沒有太多的政治包袱，相信今後會有更多貢獻。西方研究可能會呈現多元態勢，實證的客觀的研究，可能會愈來愈多，但另一方面，這樣一個可以做成「分裂中國」的議題，也會引起某些學者的興趣和興奮。

同時還需看到，七十年前的這場「東突厥斯坦」運動，發生在與社會主義蘇聯一牆之隔的新疆伊犁地區，這是一個特別的地域——深受伊斯蘭教影響的多民族地區，一個特別的時代——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伊斯蘭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由此，這場民族分裂運動與社會主義蘇聯及本地的宗教勢力發生複雜的互動、交集。正因為如此，不同立場、視角的研究者，在許多問題的認識上有較大差異，限於篇幅，有關這個「共和國」問題的爭論、討論將另文專述。今後有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趨勢可能是：一、隨着各國諸



方的檔案不斷開放、解密，學者的實證研究成果得以不斷拓展，歷史的細節問題必然梳理得愈來愈清晰；二、隨着政治干擾因素愈來愈淡化，研究成果愈來愈接近歷史的「真相」，且愈來愈具有可信度；三、「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作為民族主義、宗教主義和社會主義交集的標本，可能引起相關理論家的愈來愈濃厚興趣。筆者希望在不久將來，各國、各地區的相關學者能面對面出席研究這個「共和國」的專題學術研討會，交流和切磋各自的研究心得。

### 註釋

①② 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徐玉圻主編：《新疆三區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頁136；229。

③ 紀大椿：〈蘇聯與新疆三區革命〉，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報告》，第五輯（內部刊物，1990），頁1。據紀大椿對筆者介紹，這篇論文初稿形成於1964年，1980年受時任《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總編和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要求完成內部文稿。1980年代在一些學術論壇中做過專題報告，文稿首次刊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報告》，第五輯，頁1-11。

④ А. Г. Яковл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народов Синьцзяна в 1944-1949 гг.*,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Кита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Т. XI (Москва: 1955), 155-88.

⑤ М. Кутлуко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Южного Синьцзяна (Кашгарии) в период 1945-1947 гг.*, Научные работ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АН УзССР. Кн. 1 (Ташкент: 1960), 206-18.

⑥ М. Кутлу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1944-1949 гг. В Синьцзяне как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итая.*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Ташкент: 1963), 188-98.

⑦ Н. Н. Мингул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Синьцзяна, как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обще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44-1949 гг.)*,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а АН КазССР. Т. 15 (Алма-Ата: 1962), 68-102.

⑧ А. А. Хакимбае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орен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иньцзяна в 30-х и 40-х годах XX век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No. 4 (120) (Москва: 1971), 239-58.

⑨ Т. Р. Рахимов, *Место Восточно –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народов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Втор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77), 68-70.

⑩ Зунун Таип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вободу*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⑪ 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 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84.

⑫ К. Л. Сыроежки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Кита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 2003).

⑬ Б. Бектурганова, “Уйгурский этниз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Алматы: Компекс, 2002).

⑭ К. Л. Сыроежки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Кита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518.

⑮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Max 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⑯ Allen S. Whiting and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⑰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8-228.
- ⑱ 參見 S. 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Armonk, NY; London: M. E. Sharpe, 2003)。
- ⑲ 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3); Christian Tyler, *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 ⑳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 ㉑ Linda Benson, "Uyghur Politicians of the 1940s: Mehmet Emin Buğra, Isa Yusuf Alptekin and Mesut Sabri", *Central Asian Survey* 10, no. 4 (1991): 87-113.
- ㉒ Linda Benson,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mong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92, 193, 194.
- ㉓ 紀大椿：〈蘇聯與新疆三區革命〉，頁 11。
- ㉔ 原三區高級幹部、新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烏依古爾·沙伊然閱後對紀大椿表示寫得很好，就是那麼一回事。這是紀大椿告訴筆者的。
- ㉕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蘇聯對新疆政策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增刊，頁 87-99。後收入朱培民：《20世紀新疆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 135-57。
- ㉖ 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徐玉圻主編：《新疆三區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 ㉗ 杜榮坤等：《新疆三區革命史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 ㉘ 紀大椿：〈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對新疆的滲透——兼評分裂主義的旗號「東突厥斯坦」〉，載《新疆近世史論文選粹》（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頁 167。
- ㉙ 馮大真主編：《〈維吾爾人〉等三本書問題討論會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楊發仁主編：《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研究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1992）。
- ㉚ 沈志華：〈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 213-42。
- ㉛ 薛銜天：〈試論民族因素對蘇聯調停三區革命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 68-74；〈是推進新疆革命，還是維護自身安全？——關於蘇聯調停三區革命的民族因素〉，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 345-59。
- ㉜ 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㉝ 厲聲：《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頁 161-87。
- ㉞ 陳延琪：〈論新疆三區政府農業生產的發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頁 19-25；〈伊塔阿三區政府管理機構設置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頁 89-97。杜瀚：〈論新疆三區革命中的軍事鬥爭〉，《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頁 35-41；〈新疆三區革命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頁 34-44。
- ㉟ 潘志平主編：《民族自決還是民族分裂：民族和當代民族分立主義》（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楊恕：《世界分裂主義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 ㊱ 陳延琪、潘志平主編：《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潘志平等：《「東突」的歷史與現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馬大正、許建英：《「東突厥斯坦國」迷夢的幻滅》（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 ⑳ 楊恕、曹偉：〈從哈共（布）中央的報告看蘇聯對中國新疆政策的變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頁141-46。
- ㉑ 張大軍：《新疆近四十年變亂紀略》（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張達鈞〔大軍〕：《四十年動亂新疆》（香港：亞洲出版社，1956）；張大軍：〈新疆伊寧事變與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成立及其潰滅〉，載《新疆研究》（台北：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1964），頁311-53；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台北：蘭溪出版社，1980）。
- ㉒ 許秀蓉：〈張治中與戰後新疆局勢之演變（民國34年-38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2期（1997年6月），頁155-74。
- ㉓ 吳啟訥：〈民族認同，國際競爭與中國革命〉（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 ㉔㉕ 吳啟訥：〈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7期，頁166；171。
- ㉖ 王聿均、孫斌合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頁668-95。
- ㉗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㉘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476-85.
- ㉙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 ㉚ 王柯：〈前言〉，載《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頁xv。
- ㉛ 王柯：《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國研究——中國の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 ㉜ 王柯著，馮誼光譯：《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民族」：一個來自日本的誤會〉，《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3年6月號，頁73-83；〈構築「中華民族國家」——西方國民國家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60-83；〈國際政治視野下的「新疆建省」〉，《二十一世紀》，2007年2月號，頁40-53。
- ㉝ 1933年，新疆大亂，4月12日省城迪化爆發政變，結束了省主席金樹仁的統治，握有軍事實力的盛世才坐上了「新疆王」的寶座，但動亂仍在蔓延。甘肅馬仲英部聯合伊犁屯墾使張培元向省軍發起圍攻。正當盛馬在北疆酣戰中，伊敏在和田稱王，接着，「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喀什成立，它自1933年11月12日成立，至1934年2月6日被馬仲英部攻滅，前後僅八十七天，但這是「東突厥斯坦」分裂運動在新疆首次付諸行動。
- ㉞ 三區領導人阿合買提江（Ehmetjan Qasim）在《同盟》雜誌撰文譴責「三位先生和他們的集團」，其所謂的「三位先生」指的就是麥斯武德、艾沙、伊敏三人。參見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疆三區革命領導人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及文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頁87。這還有艾沙的「自述」為證，其中有他對麥斯武德說的一段話：「我們以『三位先生』著稱，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民族主義者都非常尊重您、伊敏先生和我。」參見İsa Yusuf Alptekin,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 Derleyen M. Ali Taşçı. (İstanbul: 1985), 481。
- ㉟ 王大剛：〈書評——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年第81期，頁207。